

CHINA STUDIES

No.9

2009年春季卷总第9期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本期焦点：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

『天地异变』与中国农村研究

乡村建设中的国家、村民和社会活动家

村庄治理中资源获取的路径选择

——以关中地区南村为中心

建设征地与失地农民的非制度参与

市场转型与中国乡村内部的代谢断层



张玉林

曹诗弟

田雄 顾金土

张汝立 隗苗苗

刘春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HINA STUDIES **No.9**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國研究

2003年春季卷
總第3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研究. 2009 年. 春季卷: 总第 9 期/周晓虹, 谢曙光主
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097 - 1506 - 2

I. ①中… II. ①周… ②谢… III. ①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 丛刊 IV. ①D668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9201 号

中国研究 (2009 年春季卷总第 9 期)

主 编 / 周晓虹 谢曙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施 敏 王 绯

责任校对 / 李 敏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5.25

字 数 / 27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506 - 2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发 刊 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做是1949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1978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19、20和21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等，都既

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年5月

目 录

发刊词 / 1

主题研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

“天地异变”与中国农村研究 张玉林 / 1

乡村建设中的国家、村民和社会活动家 曹诗弟 / 18

村庄治理中资源获取的路径选择

——以关中地区南村为中心 田 雄 顾金土 / 36

建设征地与失地农民的非制度参与

——对北京市某区三个村庄的个案考察 张汝立 隗苗苗 / 54

市场转型与中国乡村内部的代谢断层 刘春燕 / 81

学术论文

假想亲属、实有地产与移民形态

——文氏宗族的追踪调查 华 琛 / 98

国家和地方语境下的族群认同 翁乃群 / 120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功能及其问题 宇都宫浩一 / 140

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从边缘到核心

——基于旁听和文本的考察 张敦福 / 161

美国政治学界的中国研究现状

——以师资、课程、刊物为观察点 赖静萍 祁玲玲 / 184

书评与随笔

内蒙古的草原生态与社会变迁

——既有的研究发现 张 雯 / 207

被殖民的性

——“海派文学”背后的另一种社会学景观 燕志华 / 217

藏彝走廊旅途印象 黄树民 / 225

英文目录与摘要 / 230

稿约 / 236

“天地异变”与中国农村研究^{*}

张玉林^{**}

摘 要 从文明史这一较长的时间尺度而言,1980 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可以看做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突变和一场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而深度受制于生态环境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如何受到这种巨变的影响并做出反应,显然应该成为中国农村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但对既有研究的回顾表明,这在中国农村研究领域恰恰是一个明显的缺失。本文以中国农村研究的引导者费孝通和近期的一些代表性学者的研究为中心,探讨造成这种缺失的复杂因素,以期对中国农村研究做出反思。

关键词 生态环境 费孝通 农村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可能没有人会否认,中国 30 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尽管难以衡量破坏和污染的速度是否快于增长的速度,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破坏和污染的速度与增长的速度一样,确实都是“史无前例”的。考虑到 30 年的时间在文明史上的短暂性(在“地质年代”这一时间尺度上则是倏忽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南京大学“九八五”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项目“乡土中国的危机与重建”课题的一部分,部分内容曾经在 2009 年 3 月于中央民族大学召开的“中日社会学国际研讨会”上报告。感谢我的同事邵京教授和中共中央党校徐平教授在不同场合对文中某些论述的批评与建议。

** 张玉林,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yulinzhang@nju.edu.cn)。

之间), 我们有理由用“天地异变”来表述这一时段的中国生态环境变迁——抛开它带有容易让人生疑的“自动”的含义, 的确可以将其看做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突变, 以及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

作为农村问题研究者, 有必要重点关注这一“突变”或者说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与中国的农民生存、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而作为这项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理应首先回顾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

众所周知, 自从 1957 年的“反右”运动导致中国内地的学术研究高度意识形态化而逐渐萎缩, 在其后的 20 多年间, 由中国内地学者展开的中国农村研究几乎销声匿迹。而 1978 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 也让中国农村研究根本改观: 在 80 年代初随着农村调查的兴起而重新复苏, 并很快走向繁荣。在迄今为止的 30 年间, 发表的有关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著述称得上汗牛充栋。以著作而论, 不包括农业经济学领域的著述, 仅由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者以及其他难以确认其学科归属的人士出版的书籍即多达数百种。而从论文的数量来看,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www.cnki.net) 的检索发现, 在 1994~2007 年的 14 年间, 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中直接以“农村社会”为题的论文就达到 2937 篇, 而专业性的“核心期刊”《中国农村观察》同期发表的论文即达 700 多篇。此外, 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批有关“三农”问题的专业性学术网站如“中国农村研究网”、“三农中国网”, 以及多种连续出版物如《中国乡村研究》、《中国农村研究》、《三农中国》等, 也都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述。

面对数量庞大、水准不一的农村研究著述, 进行一揽子式的综述和批判并无必要, 进行分领域的梳理和辨析也并非本文之兴趣所在。我所关注的是与生态—环境主题直接相关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 在 30 年来的中国农村研究中, 生态和环境因素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学者们如何理解生态环境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关系? 第二, 已有的涉及“农村生态”和“农村环境”的研究, 触及和理清了哪些问题, 又有哪些方面存在着空白和遮蔽?

二 “乡土”的自然性缺失: 费孝通的农村研究

大致说来, 在专业的农村问题研究者的著述里, 基本上看不到“生

态”和“环境”，少有学者注意到生态环境变迁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的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论及这一问题，不能不首先想到一位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他就是对中国的农村研究具有重要引导作用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

众所周知，从费孝通 1936 年初次到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调查而写出著名的《江村经济》，直到他学术生涯的末期，他一生关注的都是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基于早期对中国农村存在的贫困和饥饿现象的深刻印象，他希望找到中国农民摆脱饥饿和贫困的道路，希望通过农村本身的工业化来达到目的，其中既注重内生的工业化，也提倡“工业下乡”。用他自己在 80 寿辰时的感怀而言就是“志在富民”（《费孝通文集》第 11 卷：545）。当 1979 年复出之后而重新活跃于中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社会舞台，费孝通学术活动的实践意识愈发强烈。这也促使他很少写作学术论文，而主要发表随想或随感。以他所熟悉的吴江为调查基地和中国农村发展动向的瞭望窗口，他密切关注着苏南的乡镇工业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希望通过自己的总结来影响执政党的政策制定，并尽力将他所概括的“苏南模式”的经验传播和推广到全国。如他在 1992 年 7 月于香港举行的“纪念潘光旦学术讲座会”上的发言所述，他确信“中国城乡发展已找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并强调这种发展道路与西方早期工业化历史相对照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费孝通文集》第 12 卷：300）。

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包括吴江在内的整个苏南的环境特别是水环境迅速恶化。当 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掀起了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浪潮，为苏南乡镇工业更迅猛的扩张注入强大动力时，太湖流域列入监测范围的近 1200 公里河流中已经有四分之三被污染（叶寿仁等，2001）。吴江盛泽镇的印染工厂排放的废水已经将其镇区的河道染成黑河，并祸及下游浙江嘉兴的农田和鱼塘，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损失，并引发了两地长达十多年的纠纷。到了 1996 年，吴江和苏南所依凭的太湖，由于污染严重而被国家列入重点整治的“三河三湖”之列，其“富营养化”导致了周期性的蓝藻暴发，并威胁到周边城市的饮水安全。太湖流域纳入监测范围的 1240 公里河流中已经完全没有了 I-II 类水，而作为“严重污染”标志的 V 类和劣 V 类水质河段占到 50%（叶寿仁等，2001）。江南农村的大部分少年已经失去了可以游泳的地方，除非他们到城市的游泳场馆去花钱“消费”。以至于作者在十年之后去宜兴农村调查时，当地的老人们伤感地说：“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少会游泳，而我们这些老人都是会游

泳的。”

但是，这些关涉苏南农民生存和农村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在费孝通晚年的农村调查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反映。考虑到他1981年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到吴江去视察或调查，这未免令人惊讶。不仅如此，在他1996年春天写下的一篇名为《吴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短文中，竟然有“面对锦绣似的家乡山水”之类的词句（《费孝通文集》第14卷：55）。这不能不令人追问：是什么遮蔽了费孝通的眼睛？

不应该认为费孝通对于自己胸臆的抒发属于无视现实的溢美之词，也不应该苛求这位曾经的“国家领导人”^①未能真切地把握江南农村的真实状况和可能走向，以及他所说的中国城乡发展的“自己特色的道路”的长远后果。七八十岁高龄导致的行动不便，以及相应于他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而来的接待规格和善意性限制，使得他难以像1936年的调查那样，以一个年轻的普通学者的眼光去观察，与当地普通的农民进行缺少干扰的面对面交谈，了解他们在物质生活迅速改善之后还必须面对的烦恼甚至“疾苦”。实际上，坐在会议室里听取汇报和座谈，乘着轿车“走马观花”，这种在费孝通的晚期“社会调查”中占据主流的调查方式，使得他的学术目光难以洞穿江南农村被遮蔽了的另一面：路边和村中已经变黑了的河流，以及正在因为复合污染而逐渐染上“毒性”的土地，而这意味着在增长、发展或繁荣的外观下包裹着巨大的隐患。

当然，在同一篇短文中，他也有限地注意到了“水”的问题。在谈到“昨天的努力造就了今天的局面”之后，他轻描淡写地谈到了“问题”：“我首先想到，家乡的先民靠着太湖水、运河水的滋养和利用，才赢得了‘天堂’之誉。水是‘天堂’的本钱。吴江的明天，照样需要我们多注意利用这个本钱，下大力气整治太湖，开发太湖，整治运河，利用运河。”（《费孝通文集》第14卷：59~60）

到了1997年，费孝通在当年5月到浙江湖州参加“环太湖四市社会经济发展论坛”期间，似乎了解到了关于太湖污染的更多信息，并在随后写下了一篇短文《说太湖的水》；而在他于6月第三次访问山东滨州期间，当地的官员也向他反映了黄河水污染所带来的困扰。这被简单地记

① 作为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从1983年起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4月转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在后来继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直到1998年3月退任。

录到了他的一篇名为《三访滨州》的旅行散记中（《费孝通文集》第14卷：279~281）。

但是，从已经整理出来的费孝通的著述来看，直至20世纪末，他对于已经全面爆发的中国内地的环境危机的关注也仅限于此。^①而且，基于他所得到的有限信息，他对于问题的“解决”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比如，当他提及沿太湖各市对于污染的治理问题时写道：“对此，沿湖各市提供了具体数字，令人满意。领导上的重视和各市人大的立法和监督是见效的。”（《费孝通文集》第14卷：213）他并没有进一步意识到太湖以及黄河污染背后的社会机制、社会动力等深层次的问题，“环境”也没有嵌入到他关于中国农村和中国整体发展的宏大思考之中，并没有成为判定“发展”或发展的代价的一个重要尺度。

在1998年11月提交给某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告《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问题》一文中，他依然坚信：“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角度看，现代中国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表现出了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工农对立、城乡对立完全不同的面貌，它们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挥着沟通、协调、缩小差别、促进融合的建设性作用。”（《费孝通文集》第14卷：419）

无疑，费孝通的这一论断本身包含着对于西方早期工业化历史的深刻反思，也可以说是对一种“发展观”的反思。从早期的乡镇企业曾经扮演的“以工哺农”的历史角色和小城镇发展的内生性来看，这一结论确实是可以成立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纳入“环境”要素——更确切地说是“回归环境”——便会发现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因为正是在环境这一领域，乡镇企业恰恰自始至终地凸显着“工”与“农”的对立。^②而一旦舍弃了“环境”，他的反思也就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局限。虽然他的学术话语并不像现代中国文豪郭沫若的诗性话语以及开国领袖毛泽东

① 徐平认为，考察费孝通对“问题”的关注和言说不应局限于他公开发表的著述，他的独特身份使得他难以像一般学者那样“自由地”公开发表见解，很多他在“小范围”的讲话或建议是难以见诸文字的。这一提醒有助于我们在分析费孝通的学术活动时保持谨慎。但“谨慎”的态度不应该妨碍分析的尝试本身，由于我们可能永远都无从了解他那些难以见诸文字的见解，所以分析的尝试只能建立在公开的著述之上。

② 当然，工与农的对立不仅仅体现在环境方面。抛开价值判断而言，农村工业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工业取代农业的过程，这种取代在中国近期的实践中已经很少具有早期“以工补农”的含义，而是具有浓厚的否定色彩。从“消灭农民”而使他们变成“市民”，到“村改居”，再到一些地方鼓吹建立“无粮乡镇”乃至“无粮县”，都是其典型表现。

的政治话语^①那样令人惊奇，但是在评价工业化的“进步”意义时所看到的都是单向度的“进步”这一点上，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逻辑同构性。

当然，正如不能苛求诗人郭沫若和政治家兼诗人的毛泽东具有超越时代历史限制的“先见之明”一样，也不应该苛求作为学者的费孝通在1980年代乡镇企业刚刚开始、普遍的环境恶化问题尚未浮现之时就具有先见之明。但是，如果将费孝通还原成他本来的角色——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中国农村研究者，那么就不能不指出，在中国所处的那样一个大转变的时代，他实际上缺少一种不应该缺少的问题意识：自己密切关注并积极提倡的农村工业化或工业下乡，到底可能或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又更多地由什么人去承受？确切地说，每年以20%~30%甚至更高的速度扩张的苏南农村工业，除了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之外，对于江南水乡的土地、河流、天空，以及生活于其中的芸芸众生来说，到底在终极意义上意味着什么？其过大的生态环境代价能否避免，或者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

进而，如果我们将费孝通的这种对于环境状况的“无视”与日本的社会学家福武直加以对比，就更加值得深思。作为“二战”以后日本农村社会学乃至整个日本社会学界的领袖人物，福武直自1970年代末开始与费孝通有所交流，并被费引为“海外知己”。费孝通在1990年写下的《缅怀福武直先生》中自认为与福武直“在立论观点，为学方法上我两人却又何其相近”（《费孝通全集》第12卷：2）。但福武直早在1950年代初就开始深度关注日本当时逐渐严重的环境问题，并组成了以他为首、有其多名门生参加的调查团，主持对群馬县安中町的冶炼工厂引起的“矿害”问题的调查，并发表了题为《近代矿山与地域社会的展开》的调查报告，揭示了“矿毒”对当地的土地、森林、河流造成的严重破坏，并指出因为缺少有效的治理而成为典型的区域性社会问题。随后，福武直又主持了对三重县四日市大气污染的调查，其调查研究结果收入了他主编的《地域开发的构想与现实》三卷本著作中的第三卷。在此基础上，福武直在东京举办了以“公害与地域社会”为题的系列公开讲座，其讲稿后来成为1961年出版的《公害》一书。在福武直的影响下，北川隆吉、青井和夫、饭岛伸子等人也先后开始了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并对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

① 郭沫若曾将黄浦江畔的工厂烟囱里冒出的黑烟看做“20世纪文明的黑牡丹”（杨海鹏，2001）；而毛泽东则曾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以命令式的口气要求当时的北京市长：“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哲夫，1998：6）

推动作用（王子彦，1999）。

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的原因何在？这显然不是由于福武直（以及日本农村社会学）相对说来更注重实证取向的研究方法所能充分解释的。它或许与完整的“社会”无法进入费孝通的视野，而福武直虽然在日本社会学界也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却没有优厚的政治待遇——因此他是一个自由人，不会为政治所遮蔽——有关。

需要申明的是，如此追问并没有指责这位社会学家“无视现实”的意图。实际上，在目前活跃于中国内地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当中，也许没有人比这位已故的学术前辈具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报国”情怀。导致他未能关注环境恶化这一工业化的“副产品”的原因，除了前文指出的健康上的限制和政治遮蔽之外，或许也与他过分执著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或“致富”，并且为现实中快速蔓延的“发展”、“繁荣”而过于兴奋有关。众所周知，在费孝通的生命历程的最后二十多年间，他不仅是中国的学术领袖，也被普遍看做中国的“社会领袖”（1994年在菲律宾他获得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他自己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放到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引路人的位置，在1987年10月接受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的访谈时，他曾经这样描述他自己的角色。

说到我的任务可说是一个宣传员，一个高级宣传员。我摆事实讲道理，描述和分析新生事物，并向掌握政策的人提出建议。

我的任务，首先是指出正在发生中的乡镇企业的重要性。我必须说服人们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和根本的变迁，我们必须支持它。它将缓和人口问题，它将使中国大城市不致过分膨胀，它将使我们的乡村生产力大大提高，它将使我们的人民能够享受前所未有的繁荣。（《费孝通文集》第11卷：187）

而当巴博德问及“你当前的研究兴趣”时，他这样回答：“我的第一个兴趣是江苏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推广。第二个主要兴趣是在中国的边区。”（《费孝通文集》第11卷：189）

不能否认，这种兴趣所蕴含着的宏大关怀弥足珍贵，值得钦佩。但是也必须承认，这种“高级宣传员”的自我定位，事实上与他所说的“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唯一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费孝通文集》第11卷：146）这种学术志向之间很容易造成冲突。当他述说“我的确想要跟踪正在发生的变化，去理解它，并把它记录下来”（《费孝通文集》第11

卷：184）时，我们自然会追问，难以脱离倾向性的“宣传”如何能避免“选择性遗忘”，确保“记录”的客观？当他坚信“中国人显然在做某种新的事情”，强调“我们必须把人们从这种乡土束缚中解放出来”时，他纵然也意识到了“究竟会出现什么结果我并不真正知道”^①（《费孝通文集》第11卷：184，186），但是“高级宣传员”的角色终究妨碍了他对这一重要未知领域的必要关注。他在急切地前行，以至于没有意识或精力停下来沉静地打量打量。

当然，指出这两种角色的纠缠所造成的影响似乎还不够，还难以充分解释费孝通为什么没能关注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对他的农村研究的原点进行分析。

在费孝通的研究中，自然、地理、环境虽然是未被抛弃的因素，但也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在其早期的《江村经济》中，他简单地描述了“江村”的地理状况（费孝通，2002：26～28），但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背景来看待。这同欧洲早期的经典社会学家的处理方式相类似，也即将自然当作既定的或不变的因素，而社会、文化是在一个不变的自然环境中生成和演变的。换句话说，他并没有将自然、生态及其变迁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影响当作一个社会事实纳入考察视野。在他那脍炙人口的《乡土中国》中，他固然较为准确地将“土地”标定为乡土中国的基础和原点，但“土”是农民的“命根”这一判断，依然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他所强调的是乡土空间（中国基层社会）相对于“现代社会”的世代定居性、地方性和非陌生性、血缘和地缘，以及与此相关的被称作“差序格局”的人际交往方式，等等（费孝通，1998：6～17，24～75）。其中缺少清晰的自然、生态的维度和内涵。因此，很难说费孝通笔下的“乡土”是完整的乡土。

按照美国早期的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年鉴》（1997）中的理解，土地是由土壤、水和植物构成的一个生态系统。与城市人相比，植根于土地的农民不仅是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者或“消费者”，而且是与在工厂或办公室里“工作”的城市居民不同的田野上的耕作者。在特定的自然环境而不是人造的钢筋水泥结构的空间中从事劳作的这种职业特点，使得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更直接、全面地依赖于土地这一生态系统，更多地包容在或暴露于自然环境之中，从而也就既养成了他

① 费孝通进而强调：“没有人能真正知道这点。我只知道中国将要改变。”（《费孝通文集》第11卷：186）

们对于自然环境的高度感应能力（这种能力在城市居民中已经日渐麻木或丧失），同时也使他们连同那作为生命生产过程的农业一道，更直接地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和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因而，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对于农业和农民所造成的损害也是全面的和无所不在的，这构成了对于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存世界的系统性破坏（张玉林、顾金土，2003）。而缺少这种问题意识，必然导致农村研究中的重大缺漏，乃至造成某种不能允许的遮蔽。

当然，必须注意到费孝通晚年对于自己的以及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界的学术取向的某种反思。当1990年代末逐渐从民盟中央和全国人大的公务中淡出后，费孝通开始强调“补课”和“文化自觉”，也主张“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①。他在部分篇章中论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对立”，甚至在2002年5月南京大学创立100周年的学术讲演中提到“最近在我国北方出现的恼人的沙尘暴，的确是我活到90多岁后才切身经历到的最恶劣的天气”，并将其看做“自然的反抗”的一个例证（《费孝通文集》第16卷：28）。但是，他所强调的主要是“文化”、“精神文化”，是“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而关于人与自然的“对立”的论述也主要指向“西方”，至于中国的“自然的反抗”现象并没有纳入他号召扩展的“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之中。因此，虽然费孝通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5月呼吁同仁们“要对时代变化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费孝通文集》第16卷：235~240），但是由于他的生命历程很快到达了终点，他本人对于巨变中的时代的反应也就难以再进一步。

或许，我们可以用费孝通在《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与本文所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的遗憾。文中透露出一位足以称得上“大师”的社会学家的谦逊，但也确实道出了实情。

我已说过多次“身逢盛世”。时代是对得起我的，但我却有点负了时代，我自认为自己远远没有赶上时代动态的步伐。我所处的这个盛世已为我提出了多少有意义的题目，但大多我却让它们在手边滑过去了，至多也只能说掠得一点影子。（《费孝通文集》第15卷：134）

① 相关论述见收入《费孝通文集》第15~16卷的下列文章：《世方激变 赶紧补课》、《关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谈话》、《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等。

三 既有研究的发现与问题

费孝通的中国农村研究中“环境”的缺位，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存在的普遍现象。以专业性的“核心期刊”《中国农村观察》^①为例，在其1994~2007年刊发的747篇论文中，涉及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论文只有11篇（相关分析后述）。而在19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较具影响的农村研究著作，同样基本没有涉及农村生态和环境问题。

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系统调查基础上的个案研究，二是较宏观的有关农村问题的田野考察笔记。在第一类研究中，通常也有关于研究区域的自然地理状况的介绍，^②不过这种介绍只是用来标示其研究对象的地理方位，或仅仅作为简单背景，农村的生态和环境并没有被纳入考察范围。这当然与作者们的关注点主要放在政治、经济关系等领域有关，也可能与研究区域在相关时段内并无明显的环境恶化（因此环境也就进入不了作者的视野）有关。但是，当所研究的村庄存在着明显的环境恶化——比如“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的灰蒙蒙的天空——对于环境的无意识或无视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而当这种缺憾也同样出现在后一类研究中，它就变成了不容忽视的缺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拥有较大影响的《黄河边的中国》。在这部涉及河南省的十多个县（包括黄河及淮河流域）的农村调查笔记中，作者敏锐地揭示了乡村社会的诸多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曹锦清，2000），却未能注意到“黄河边”以及淮河边的农民因为水环境的恶化而蒙受的灾难。这是因为，后一类研究往往涉及中国农村研究的“问题意识”、“国情意识”等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贺雪峰，2003，2004），其作者往往是对中国农村有着深入了解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的学者，他们通常没有染上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看得比中国“社会”的现实形态更加重要的毛病。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他们所着重论述的“国情”和“国情意识”存在着对生态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的无视，就意味着其研究本身的残缺性，而且会因为其拥有的影响而对读者和农村研究的后来者造成误导

① 原为发刊于1988年的《农村经济与社会》，1994年起改称现名。

② 比如在曹锦清等人所著《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的第一章即为“生态环境与村庄”，提到了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与村庄的形态乃至名称等的关系。